



康巴周末

文化视野

2022年4月15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泽仁 组版:张磊

一段绝世的舞蹈 ——读张爱玲小说《白玫瑰玫瑰》

◎杨军

陈娇蕊是盲从的,这个《白玫瑰玫瑰》中的女主角不同于张爱玲小说里的任何一个女人,虽然她也是漂亮的有着讲究的服饰,时髦的卷发,涂着红色的口红,半夜时分,赤裸着脚接电话,一只脚轻轻地蹭着另一只的脚踝。可是她又真的不同于其他的女人,比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她不像她那样将婚姻当做人生的一件事业对待。

陈娇蕊多情、浪漫、天真、热情,每一句话都是出于心,而不是出于口。她爱佟振保,是遇到他之前从未有过的爱,虽然她已为人妇,并且还算幸福,但是她并不能够叫自己坐在沙发上,闻佟振保外套上的味道,并不能够拒绝佟振保将她压在钢琴上,弄出很大声响。她自顾自地离婚,并且认为佟振保是希望她离婚的。然而历经生活洗礼的张爱玲是不喜欢陈娇蕊的性格,她的不喜欢决定了振保的不喜欢。因此,“第二天再谈到丈夫的归来,她肯定地说,就在这两天,他就要回来了。振保问她如何知道,她才说出了来。她写航空信去,把一切都告诉了洪,要他给她自由。振保在喉咙里“哦”地叫了一声,立即往外跑,跑到街上,回头看那公寓,灰赭色流线型的大屋像大得不可能的火车,正冲他轰隆隆隆隆开过来,遮得日月无光。”(《白玫瑰玫瑰》)结局就这样出乎陈娇蕊的意料,这个用了感性恋爱,而不是思维恋爱的女人,从来没有想到会遇到男人的拒绝。她趴在佟振保的病床前痛哭,像每一个受到爱情欺骗的女人,眼泪,委屈,长时间地跪坐,却得不到那个男人的一句安慰。

“娇蕊,你要是爱我的,就不能不替我着想。我不能叫我母亲伤心。她的看法与我们不同,但是我们不能不顾到她,她就只依靠我一个人。社会上是不肯原谅我的——土洪到底是我的朋友,我们的爱只能是朋友的爱。”结局就这样出乎陈娇蕊的意料,她抬起红肿的眼睛,飞快地站起身,看也没看佟振保一眼,就走了出去。多年后的相遇,是那样的寻常,再平常不过的交谈,再平常不过的相遇,“是从你起,我才学会了,怎样爱的,认真的……爱到底是好的,虽然吃了苦,以后还是要爱的,所以……”话是陈娇蕊说的,然而哭的却是佟振保。

虽为男性,但我也比较喜爱张爱玲的小说,曾经于几年前在上海的一家3D电影院看过她小说改编的电影,虽然没有看到低低暗垂的深紫色的金丝绒窗帘,但是仍然能够感觉到张爱玲在大厅的一角慢慢地看着我,没有音乐,没有手指与手指的交缠,只有在荧屏上用奇丽的文字,优美的情节来吟吟低吟的那一段绝世的舞蹈。那舞蹈舞呀舞,蹈呀蹈,舞呀蹈,脚尖,幻化出霓虹灯式迷离的节奏。美是美的,但是舞者却是怎样平静的一张面孔:似水的年华,流水的岁月,坐愁的红,爱情是什么,清朝夜空下的一段月影,花儿绽放时的那一缕清香,是最短与最靠不住的东西。

不知道什么样的生活阅历,给了张爱玲这样冷静的人生感悟。当她在洛杉矶的寓所静静走完人生的最后历程时,她拒绝了任何人的陪伴。所有爱过的,恨过的,生死相许的,都如空气一般存在,虚无,冷淡,无从触摸。故事、情节、男女主角的眼神、语言,一如冬日玻璃上的彩绘,绚烂而又冰冷,美丽里面透出冷静的残酷……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的老火车站“复活”

前南斯拉夫影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的拍摄地点之一比斯特里察火车站经修缮后,6日作为旅游景点正式对外开放。

修缮后的比斯特里察火车站面貌一新,一楼是餐饮区,有咖啡馆与餐馆;二楼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纪念展览馆,陈列有影片导演克瓦瓦茨和影片主要人物的蜡像,以及片中部分道具。

比斯特里察火车站建于116年前,由当时占领萨拉热窝的奥匈帝国建造,是连接维也纳与萨拉热窝铁路的终点站。20世纪70年代,前南斯拉夫对铁路网进

行现代化改造时,比斯特里察火车站被废弃。

在1972年公映的前南斯拉夫著名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有以比斯特里察火车站为背景的情节。

据新华社

8

从康巴人生存哲学进入 从康巴人生存智慧进入 从康巴人生存心境进入

《纸上烟云》:将文物修复的光照进了创作

◎钱飞雁

国内首部以古书画修复为题材的解谜小说

古人以“烟云”指代书画,董其昌曾言:“画家之妙,全在烟云变幻中。”云烟障眼,悬念丛生,《纸上烟云》的故事就从一幅旷世名作开始,拉开了古代书画背后的重重疑云。

清代扬州书画修复匠人吴墨林为康熙修复了污损的《千里江山图》,后入官为皇家书画做修复工作,并被任命为图籍司主事。吴墨林表面是修复匠人,实际却是假画贩子,他临摹的书画以假乱真,但逃不过官中图籍司副主事刘定之的法眼。二人在官中暗中竞争,尔后在雍正夺位中因修复有污渍的遗诏而立下汗马功劳,又领命南下寻找惊天宝藏。两位修复匠人与一众江湖异士,循着藏在历代名家书画作品中的线索,在寻宝宝的过程中,一步步接近历史背后的真相……

《纸上烟云》是国内第一次以书画修复为题材的小说,它融合了古书画鉴赏、书画修复、解谜等多种元素,既有传统文化底蕴,又具有环环相扣、层层揭秘的悬疑小说特质。可以将这些元素成功地融合在一起,构建出独一无二的古书画悬疑作品,得益于作者作为一名古书画修复师的身份。

作为一名国家纸质文物修复师,李屹东面对珍贵的古籍孤本时总是小心翼翼,对着发黄变脆、薄如蝉翼的纸张不敢大声喘气。但是在文学创作中,他以“南北颠”的笔名,在小说创作中天马行空,肆意地把对文物修复和古书画的热情挥洒得淋漓尽致。

将文物修复的光照进了创作

古籍修复自古以来就是属于匠人之活,书画装裱工作枯燥且考验耐心、专业性又强,从事这份工作的人屈指可数,他们往往独自与故纸堆作伴,难免清冷孤独。历史上关于古籍修复的记录也不多见,经学者钩沉爬梳,才对历史中修复匠人的事迹有了一些了解。如唐写本《佛名经卷第十三》有题记:“沙门道真修此经,年十九,浴(俗)姓张氏。”道真是五代宋初敦煌三界寺管理佛经的一位僧人,他收集了各寺损坏的古经文加以修补,重建了三界寺藏经,也是敦煌文献中有记载的唯一一位修复工匠。自古以来,不知还有多少这样的古籍修复师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留存而付出过自己的心血!

《纸上烟云》的作者李屹东曾在央视纪录片《古书画复活记》的镜头下展示了他的日常工作中鲜为人知的一面。这部纪录片采访了数十位国内一线古籍保护专家与学者,记录他们在古籍修复工作背后的付出与坚持。作为一位年轻的80后古籍修复师,李屹东站在一幅色彩脱落严重的画卷前,凝神屏息地为画卷上色。古籍修复师与作品之间,就如进行着一场跨越历史维度的对话,只有他自己才能心领神会。

在小说中,他将自己古籍修复师的工作经验和对古书画的理解,投射在两个清代宫廷修复工匠身上——吴墨林和刘定之。这两位匠人对书画修复的技艺和对书画鉴赏的认识都有着不同的理解,他们一个市井匠气,一个清高迂腐,但对书画都怀着狂热真挚的感情。他们之间互相较量,是艺术上的竞争;他们与朝廷之间的决裂,是权力与艺术之间的博弈;他们在寻宝与解谜之中,探寻的是关于艺术的真知灼见。

作者不仅将文物修复的光照进了创作,点亮了国内小说关于古书画修复题材的空白,更以天马行空的大胆构思立体化了历史上众多不为人知、无文字记载的书画修复匠人的形象,让他们的脸从故纸堆中抬起来,对着我们嬉笑怒骂,活生生地呈现。同时我们也在作者的文字中思考:艺术的价值是什么?古往今来,那些修复匠人为什么甘于坐冷板凳,为什么执着于薄薄的一张纸上,为修旧如旧而费尽心思?

悬疑元素与书画修复技艺的融合

《纸上烟云》虽被归入悬疑类型小说的范畴,但小说题材与内容都极具文人气质和传统文化底蕴。在这部小说中,我们既能充分体验到处处巧设悬念、情节跌宕的阅读快感,又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艺术特质。作者将古书画修复技艺的手法和门道通过匠人吴墨林的作伪和修复情节呈现得精彩绝伦,又经过艺术加工,使故事更具可读性。

比如书中写到吴墨林为讨好刘定之,投其所好而仿作朱奔的《鲤鱼图》,作者就在情节中融合了做旧的窍门:“吴墨林回到家中,紧闭房门,取出纸笔,构思片刻,濡墨挥毫,不多时便画了一条鲤鱼,又仿着朱奔的书法,题了名款。从囊匣中取出一个大木盒,翻找出朱奔的假印章,按了印泥钤盖上去。他的造假技术已臻于化境,不过半个时辰,就如行云流水般造出一件假画,略一扫视,觉得纸墨少了点旧气,于是在厨房熬了一锅猪油,将这张画悬挂在灶台上,用慢火熬煮猪油,烟熏了一晚。待到天明,那鲤鱼图果然裹上一层旧气。”

又如作者写到吴墨林为康熙修补《千里江山图》时写道:“吴墨林长舒一口气,连夜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还剩下关键的一步。只是这一步,还得确保没人看到,要是皇帝知道了这一步的程序,准保不会龙颜大怒。只见他偷偷摸摸用手指沾了点唾沫,在自己的胳膊窝里搓下来一点泥垢,然后用这点泥垢,在新补的绢丝上反复摩擦,那鲜艳的颜色慢慢就没了火气。他仔细端详了一会儿,不大满意,又用手指在头皮上磨蹭了许久,刮下来一点头油,涂抹在绢丝上,反复数十次之后,新补的绢丝竟然被头油蹭出一点几包浆的柔光,到这时候,才算大功告成。”

这些专业的书画修复技巧对普通读者既显得陌生,但又妙趣横生,吸引着我们一步步地走向书画修复匠人的独特领域。

这部作品的另一惊喜之处,是作者为小说解谜情节而创作了多幅书画作品。作者毕业于中央美院,谙熟中国古代书画家和流派的特点,因此在小说中为解谜和情节需要而创作的书画不仅为作品增色,而且还让读者可以一窥作者的丹青技艺和艺术才华。

新世纪以来的藏族儿童文学

◎朱永明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儿童文学有着非凡的意义,儿童文学是成人专门为儿童创作的文学,为儿童提供精神娱乐的同时,拓展了儿童的阅读视野,教育儿童遵守社会公德,引导儿童追求真善美,是陪伴儿童健康成长的精神养料,它的可贵之处是儿童在日常化、自然性的接触中实现润物细无声的审美效果。

藏族儿童生活在相对封闭的涉藏地区,陪伴他们成长的主要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兄弟姐妹等。独特的藏族生活习俗,雪域的自然景观,相对滞后的交通与固有的生活模式,使得他们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和亲近自然的生存本能。新世纪以来藏族儿童文学创作取得令人可喜的成就,但也留下了诸多的缺憾。

新世纪作家群的构成及其作品创作

新世纪以来,作家群体的构成与创作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从新时期进入新世纪作家的儿童小说创作,主要包括益西泽仁的《依姆琼琼》《白云行动》,单增的《小沙弥》,拉巴措措的《三姊妹》等;二是“60后”与“70后”作家的儿童小说创作,主要包括阿来的《三只虫草》(中篇小说)、《蘑菇圈》(中篇小说)、《狗孩格拉》(作品集)、《阿古顿巴》(作品集)、《群峰飞舞》(短篇小说),杨志军的《巴颜喀拉的孩子》(系列长篇小说),次仁罗布的《雪域童年》(系列儿童小说三部曲),万玛才旦的《乌金的牙齿》《气球》《牧羊少年之死》(短篇小说)等,龙仁青的《放生》《人贩子》《水晶花》《唐僧肉》《倒计时》(短篇小说),觉乃·云才让的《牧云记》(系列长篇小说)等;三是“80后”为代表的藏族作家创作的短篇儿童小说,主要包括赤桑华的《雨衣》,此称的《唐果盒》,秋加才让的《数汽车的孩子》,何延华的《彭禾的夏天》,永基卓玛的《九眼天珠》,尼玛玛多的《球珠的心事》,王小忠的《樱格格》《倒天约》等。目前看来,次仁罗布、杨志军等作家的《雪域童年》和《巴颜喀拉的孩子》两部系列儿童长篇小说是新世纪儿童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成果。

《雪域童年》十分生动地写出了涉藏地区孩子最天真的爱;《巴颜喀拉的孩子》在藏族纯朴的民俗文化中表达出藏族儿童的优秀品质。

考量新时期以来的儿童文学,不难发现藏族儿童小说在新世纪出现了较为繁荣的一波,其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受新时期以来主流儿童文学发展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充满游戏性的“皮皮鲁”形象;20世纪90年代以轻松幽默的幽默与自我书写的“男生贾里”形象以及新世纪初的“马小跳”“大头儿子”这些极富调皮形象的出现,加上以沈石溪、黑鹤等主流儿童作家以“狼”为书写的中心的系列动物小说,使众多的儿童沉迷于各大书店的“动画区”,这一现象引起了藏族作家对儿童文学的热情,尤其是曹文轩、科幻三体的获奖更成为藏族儿童文学创作的精神动力;二是儿童文学意义的发现推动了藏族作家的创作转向,目前文学界对儿童成长的爱,张锦贻等老一代作家学者对儿童文学的重视和引导,加上国家在教育上各种惠民政策的落实,使得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认识到儿童教育的重要意义,目前藏族作

家中有一部分作家将主力转向儿童文学创作,这将是未来藏族儿童文学发展的良好机缘;三是藏族先辈作家的引领,20世纪80年代初以益希卓玛、昂旺斯丹珍、益西泽仁等为代表的藏族作家对涉藏地区儿童文学题材的开拓,益希卓玛长篇小说《清晨》的获奖等都为藏族儿童小说开辟了美好的前景。

不难发现,对藏族童年精神的塑造,对藏族自然景观与美好人性的呈现,对藏族儿童淳朴天真性格书写等无疑成为藏族作家重在表现的主题,藏族儿童文学自觉撑起了儿童教育的一片天空。

藏族儿童文学的缺憾论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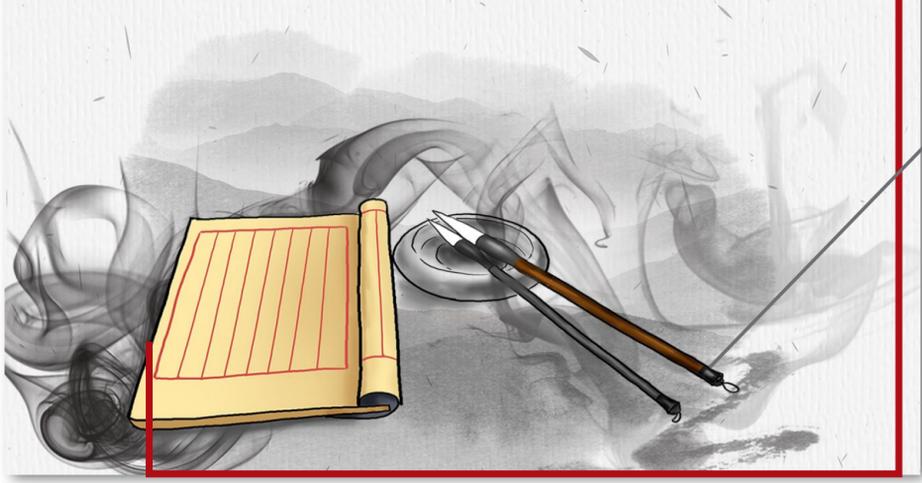
涉藏地区有儿童文学广泛的取材资源,奇珍的物产,广袤的草原,清澈湖泊和碧蓝的天空,独特的藏族习俗,藏文化、格萨尔文化,彪悍纯朴的藏族牧民等都可以成为藏族儿童文学的取材富矿,但目前来看,藏族儿童文学创作主要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缺憾。

一是专业作家的缺失,大多数作家将儿童文学创作作为一种“边角料”。目前致力于藏族儿童题材的专业作家主要有唐明和觉乃·云才让,唐明以青海为创作源,创作了《我叫更嘎》《德吉的种子》《带着我的小马回草原》《寻找达洛》《脸上有鱼纹的孩子》等代表性作品集和多部儿童短篇小说。《我叫更嘎》中唐明塑造了多个单亲家庭的儿童形象,生动乐观地书写了他们成长中的艰难,树立了一种中国涉藏地区式的童年精神;《德吉的种子》中唐明把本色的藏文化表达与儿童纯朴的生态情怀有机接合在一起,书写出了藏族儿童求真向善的美好品质;《带着我的小马回草原》中,唐明塑造了“格萨尔”王式的儿童英雄形象,可以说她是成就卓越的藏族儿童专业作家。觉乃·云才让新世纪后也专门致力于藏族儿童文学创作,他的儿童系列长篇小说《牧云记》刻画了独立自主、尊老爱幼的藏族儿童形象。

二是儿童诗、儿童散文、童话、童话、儿童散文等的严重缺失,使藏族儿童文学呈现出一种“孤立”姿态。目前具有代表性的童诗有贡卜扎西的《阿妈要摘的星》《草原》《则谷石林短歌》《童心》,刚杰·索木东的《这个季节,请你到草原来》《致童年》这几首;儿童散文除了王小忠的《堡子记》《三十年前的那只猫》之外几乎就鲜见了。总之,藏族儿童文学体裁的单一使得很难把藏族儿童快乐天真的童年生活铺展在世人面前。

三是儿童文学题材的影视改编力度不足,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藏族儿童文学的传播。如何让儿童文学走进儿童生活,成为儿童受益的精神食粮,影视改编是最有效的途径。目前藏族儿童文学改编的电影主要有《气球》《旺扎的雨靴》《尼玛的夏天》《藏獒多吉》等几部,这些影片不但呈现了藏族儿童最本真的精神需求,而且也塑造出了走向新时代的藏族儿童形象,这对藏族儿童文学创作来说都是一种经验,一种推动。

总之,如何推进藏族儿童文学的发展,对藏族儿童文学研究也是一条不可轻视的途径,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藏族儿童文学会迎来创作的美好春天。



扫一扫更精彩



康巴传媒



甘孜发布